



>> 一个“问题中人”而非“学问中人”

1918年11月7日，前清民政部员外郎、学者梁济与儿子梁漱溟讨论关于欧战的新闻，随口问道：“这个世界会好吗？”正在北京大学当哲学教师的梁漱溟回答说：“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。”梁济点头：“能好就好啊！”

三天之后，目睹清末时局混乱，社会失序，人心堕落，决心以死唤醒世人的梁济投水自尽。他留下遗书发问：“国性不存，我生何用？”这一天，距他六十寿辰仅有四天。

梁漱溟深知父亲的死绝非为逃避现实社会，而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捍卫，因此他决心承担起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的重任，“这个世界会好吗”成了他一生探寻的问题。

梁漱溟多次表白自己不是“学问中人”，而是“问题中人”，其一生所深切关怀的是两个问题：一是人生问题，对应近代以来中国人面临的心灵问题；二是中国问题，对应晚清以来中国的社会政治危机。梁漱溟对两大问题的回应并不相同，主张以佛教来解决人生的问题，以儒学来解决社会的问题。

小时候梁漱溟参加活动较少却爱思考，神情严肃，少年老成，同学给他起了一个外号“小老哥”，十四五岁就开始为人生问题所困惑。他看到家中女工每天忙忙碌碌，做饭、洗衣、干杂活，很是辛苦，可对方却不觉苦，脸上常有笑容；自己虽深受家人宠爱，衣食无忧，学业顺利，内心却十分苦闷。他反复思索后得出结论：人生的苦乐与外部环境无

关，重要的是自己的内心。

他早年受父亲传统儒家观念的影响，上中学后接受了新式教育，并对报纸上的新闻与时论产生了极大兴趣，“心灵隐然萌露对社会对国家的责任感”，中学毕业后即踏入社会，成为《民国报》的一名外勤记者。

往来于各种社会场合，接触各色人等，梁漱溟了解到许多不为外人所知的阴暗面。街上一白发老人拉人力车，坐车的催着快跑，老人一急，跌倒在地，下巴磕出血来，染红白胡须。他在旁边看到，“眼里也掉出泪来”，暗暗发誓“从此一生不坐人力车”。他亲身经历了袁世凯一手导演的吓唬袁世凯的“兵变”闹剧，也亲眼目睹了袁世凯窃国得逞之后举行的临时大总统的

宣誓就职大典，越来越感到理想和现实之间的鸿沟。社会良心觉悟使他“对于人生感到厌倦和憎恶”，曾两度自杀未遂。

1912年梁漱溟退出《民国报》，“谢绝一切，闭门不出，一心归向佛家，终日看佛书”。佛学使他深悟人生原本是苦难之旅，接触到的儒家学说却使他不再认为“人生是苦”，而是抱持一种乐观态度。直至1917年，梁漱溟的佛教信仰发生动摇，加上第二年父亲之死给他以强烈的心灵震撼，“中国问题逐渐占主导地位，人生问题逐渐退居次要地位”，受蔡元培之邀，他以既无学历又无资历的自学青年身份进入北大讲授印度哲学，并决心对“孔子、释迦两家的学术在课堂上负一个讲明白的责任”。

“最后的儒家”梁漱溟——是行动派，也是少数派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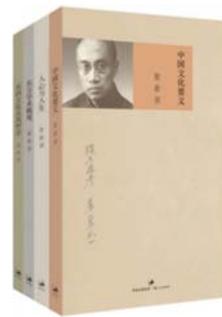
这个世界会好吗？年轻时，梁漱溟以肯定的语气回复了父亲梁济的疑问。此后漫长的人生中，梁漱溟在《东西文化及其哲学》《人心与人生》等著作中探讨中国与世界文化，并以行动让世界向好发展。他不囿于书斋，而是深入乡村，奔走后方，调停内战，立德、立功、立言，展现了一个文化托命之人的担当。今年是梁漱溟去世三十周年，翻看这位最后的儒家的履历，我们发现他不仅是一位行动派，更是一位少数派。



《这个世界会好吗？》
梁漱溟 艾恺 著
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



《朝话》
梁漱溟 著
上海人民出版社



《中国文化要义》
《人心与人生》
《东方学术概观》
《东西文化及其哲学》
梁漱溟 著
上海人民出版社

本报记者 曲鹏

>> 一个本着思想而行动的人

五四运动之后，新文化运动兴起，以一切西方文化为标准，否定传统文化的价值，梁漱溟却信心十足地宣布：“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。”1921年暑假，受山东省教育厅之邀，他在济南讲授东西方文化问题，一连讲了四十多天，由当时随行学生，后来成为著名语言学家的罗常培记录整理，随即在山东铅印成书出版，这就是梁漱溟的成名作《东西文化及其哲学》，他由此成为现代新儒学的先驱。

在北大执教七年后，由于“对当时学校教育只注意知识传授，不顾及指引学生的全部人生道路不满”，梁漱溟辞去北大教职，投身新教育和乡村建设；抗战中，他巡历敌后游击区8个月，敌兵围堵，飞机轰炸，数次险死还生，始终泰然自若；为联合救中国，他发起民主同盟，调查李闻惨案，力促国共和谈，前后奔走8年；他与毛泽东曾几次通宵长谈，激辩中国道路，1953年因向最高领袖“要较量”，成为“反面教员”；1971年，他只批林不批孔，再遭全国性

大批斗而不改初衷，傲然宣称“三军可夺帅也，匹夫不可夺志”；1975年《人心与人生》完稿，前后费时约50年，称“使命完毕，可以去矣”。

梁漱溟曾说，假如有人向他的朋友问起他是怎样一个人，朋友回答“他是一个有思想，又本着他的思想而行动的人”是恰如其分，最好不过的。

美国学者艾恺曾出版《最后的儒家：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》，把梁称为“最后的儒家”。学者许纪霖认为“最后的儒家”只是一个象征性说

法，并不是单纯指称梁漱溟个人，而是以梁为代表的整个民国知识分子即最后一代儒家。民国时，出现了一批新儒家，包括熊十力、梁漱溟、张君勱、钱穆、冯友兰等学者，“他们执着于发展儒家的义理”，在大变革时代，新儒家的发展引发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回响。“放着北大教授不做，梁漱溟居然去进行乡村建设的尝试，这是很不容易的”，在许纪霖看来，与其他新儒家学者不同，在梁漱溟身上，“儒家的实践传统表现得更为强烈、明显”。

>> 一个狂出意境与真性情的人

梁漱溟曾对两个儿子说：“前人云：‘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。’此正是我一生的使命。”语带狂妄，但许纪霖却认为狂出了意境和真性情。

1941年梁漱溟赴港筹办《光明报》，遇香港沦陷。在一路突围安全抵达广西梧州后，他在写给儿子的家书里提到脱险经过，并自信地说：我相信我的安危自有天命。今天的我将可能完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命。而且没有第二人代得。从天命上说，有一个今天的我，真好不容易。我若死，天地将为之变色，历史将为之改辙，那是不可想象的，乃不会有的事！

事后梁漱溟再读这些文字，也自认“有狂妄之嫌”，却是“当时心理状态的真实写照”。

许纪霖对梁漱溟的“狂”表示认同，“使命感是儒家精英主义的根本所

系，对于一个确信自己承受了天命的狂者来说，因此而无限放大自我，将一己之自然生命与整个民族和文化的前途接通”，“狂”的背后有德性和知性支撑，因此“狂”得“有底气、有厚度”。

相比于狂，梁漱溟更喜欢“廓然大公，物来顺应”的人生态度。艾恺在采访晚年的梁漱溟时，问及他对陈独秀和胡适的看法，梁回答：陈独秀“这个人了不起”，胡适“这个人很聪明”。在长子梁培宽印象中，父亲从不在背后议论别人的缺点、毛病，认为这种事由他自己反省去就是了，在背后说来说去有什么用？

不揭短，不背后议论人，并不意味着梁漱溟处世圆滑，无视原则。在公开场合，对老朋友他也不讳言自己的看法。梁漱溟与熊十力的友谊有四十余年之久。熊晚年致力于建立自己的儒学思

想体系，花了很大工夫。梁漱溟则认为儒学不光是著书立说，更要身体力行，并专门撰写长文对熊进行严厉批评。

怀着为天下立身的重大责任，梁漱溟长期以来一直过着完全合乎儒家道德规范的严谨生活。

在儒家的道德功夫论里，他强调慎独与自省：“修齐治平都在诚意上用功，都在慎独；慎独是贯内外的活动，亦即修身为本之实行。”“人在世上生活，如无人生的反省，则其一生就活得太粗浅，太无味了。无反省则无领略。”他的慎独之彻底，不用说平时的言行，连自己隔夜做的梦都要认真地加以检讨。1951年4月7日，他在日记中自责“梦中念头可耻”，次日又记：“思议大学修身为本疑问若干则，夜梦起念头可耻马上自觉”。他不

但反省自身，也以“朝会”的形式影响他人。在山东做乡村建设研究时，每日清晨与研究部同学团坐一起，由梁漱溟即兴讲授一些心得，以自己独特人生来为儒家作注解，据此出版的《朝话》一书在后世流传。

梁漱溟晚年给友人题写条幅，爱写“静以修身，俭以养德”。1988年6月他病危之时，学生李渊庭夫妇去医院探望，向保姆问及先生有无现成可用衣物以备后事。保姆答：“他只有一套料子中山服，已经很旧了。其余是几件灰布小褂。袜子是破的，鞋子也是旧的。”

外部的世界是未知的，但是一个人内在世界的好坏却在自己掌控之中。从这个意义上，许纪霖认为梁漱溟以他的道德的实践，儒者的担当，向世人展示了一个有厚度的生命。